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

胡 国 瑞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这完全是由我国文字之为独音体所决定的。由于文字为独音体,乃可有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并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这种现象,由来久远,如《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论语·卫灵公》说:“言忠信,行笃敬。”《周易·乾卦文言》说:“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其它各种长短不齐的偶句,在经传诸子中可常见到。这种骈偶的句子,虽在古代著作中可见到许多,但各在其所处篇章之内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的出现,往往在意义紧要之处。因为在单散的文句中,忽然插入个别的整齐偶句,更富有警动人的效果。如古人常在言谈中引用的谚语或成言,多为整齐的偶句,即可证明这种作用。但在文学作品中,骈偶辞句之由偶然出现而至全篇一致,其发展历程仍是很长远的。

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我们可从“四史”的传论中察出明白的迹象。因为史书的赞论和序述,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足以显示各个时代文学艺术的风格特点的。我们试先看《史记》的《酷吏列传论》: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邳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寝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贍,何暇论

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汉书》的《酷吏列传》大部分是因袭《史记》的,就是序和赞也是如此。试看下面《汉书》的《酷吏列传赞》:

赞曰:自邳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伉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网密事丛,寝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暇,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记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导,壹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

这两篇史传论赞的内容,大致相同,它们的差异只在辞句之间,即由原来长短参差的句子,变为比较整齐而长短适中的句子。这种辞句的变动,不能认为是班固故作变异,实是受着当时文章风格要求的支配的,因为这时文章的风格正渐趋整炼。在晋初陈寿的《三国志》中,情况更不同了,试看《诸葛亮传论》: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治世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这篇传论,远非《汉书》传赞之仅在句法趋于整齐可比,它不仅在句法上而且在词义上,

都是整齐排对着的，已确具排偶的形体了。不过，在语言的运用上，它还是很质实的，并且还不会追求音节的谐美。而刘宋时代范曄的《后汉书》传论，即在这两方面跨进一步，使骈文的形式更臻完美。如其《蔡邕传论》：

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瓯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恐不密；但愿白首旧邱，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

从这篇传论里，我们可看到，句法的灵活，辞采的精美，音调的谐和，故实的征用，整个的标志着骈文形式之进入成熟阶段。

在上举的一系列例子中，《汉书》的传赞，表明了在一世纪的后五十年代（东汉中期），即已把西汉的散文，在句法上从参差不齐导上趋于整齐的道路；《三国志》的传论，显示着三世纪末的文章，除了句法更形严整，并大体上已从事词义的偶对了；《后汉书》的传论，则标志着五世纪的上五十年代（刘宋时代），文章的骈化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但是，上述现象，只是骈文发展过程的大致步骤。而作为骈文几个重要的组成因素：辞句的排偶，辞藻的敷设，典故的运用，声律的讲求，所有这一切同时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其经历途径是复杂错综的，这从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作品中可以寻察出。

早在东汉中期，《汉书》作者班固的作品如《两都赋》和《答宾戏》等，比起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东方朔的《答客难》，不仅句法更多排偶，而辞藻亦更繁富。比班固时代稍晚的张衡，其《两京赋》比班固的《两都赋》辞藻更为富丽。就在文人有意争胜的动机下，文章的形式更多地被注意讲求了。继班固的《答宾戏》之后，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海》，它们的情况都是一样的，篇中

大多数是整齐的偶句，间或从事词义的属对，而加以丰美的辞藻。这一切都表明，文章骈化的趋势，在东汉文人的创作中已经形成。

从建安以至魏末时期（二世纪末至三世纪中期），文章的骈化并非在各方面都是直线前进的。建安时代的作者，如《典论论文》所形容，在“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情势下，各在其博赡的学问基础上尽量表现其才华，因而他们的创作都辉耀着绚烂的辞采，显示着文章修辞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慷慨之气”，使其作为创作内容的思想感情，具有一种不为形式所羁束的充沛力量。因此，篇中的句法，骈散相间，随势变异，所有的偶句，都在奇句的推带下运行着。这样，在整个的篇章中，既呈现有辞句的匀称之美，并贯注着疏畅流转之气。就是偶句，除了间或有词义属对工整的，而更多的只是字数的匀称，更或有的仅是意义的相对，而不顾字句的匀称，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及“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占其王羁致北阙。”（俱见曹植《求自试表》）由此可见，这时文章辞句的偶对，还是很自然的。直至魏末时期，情况仍是如此，这在嵇康的书论中表现得很显著。于是建安至魏末时期的文章句法及由之形成的文章气势，反较东汉时期为疏畅而不似其那样凝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文章，虽尚是处于骈化过程的中期，但以其内容的充实，形式的灵活鲜美，其所形成的文质彬彬之美，使其艺术性达到这一文体的相当优美境界。

从西晋时期起，骈文形式的各个方面又趋向凝炼的道路。一篇之中，句子几乎整个是排偶的，辞句属对的成分也加多了，使用的词语力求从典籍中提取，如《文赋》所说的：“倾群言之沥液”，而事理的阐述，更多借助于典故。如下引陆机的《豪士赋序》：

且夫政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

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与！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暱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又况乎饔大茗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

这一段文章，具备着骈文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各种特征，尤其是辞句的整齐排偶属对，在骈文形式的主要因素上提出了新的榜样，这样由句法上形成的整个文章的气势也是骈整的，建安以来文章的疏散之气乃逐渐消灭，不过还未达到南北朝时有些作品那样凝滞的地步。这一方面由于作者用字还能直接切合事理，尽管其所用的字是从典籍中提炼出的。另一方面，由于用典还不太繁密，如这一段只是着重从周公与成王、霍光与宣帝的故事，反复阐明君臣嫌隙之难避免的道理，其余的几个典故则从属于这一中心义理，意思至为明显，所以在骈整的句法中，还流动着疏宕的气势。但如“政由宁氏”和“祭则寡人”，这种借喻的用典方法，则是宋齐以后因用典而致文章晦涩的开端了。

到了刘宋时代，骈文进一步表现的特征，乃是使用典故的繁多，钟嵘的《诗品序》曾指出这种情况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我们试看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选》卷四十六）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文选》卷五十七）确如钟嵘所说，几乎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非常滞涩难读了。

齐梁之际，一方面由于声律之说兴起，作者更有意识地调节声音，使有抑扬错综之美。其方法大致是使每两句为一联，每联句

末二字的音，平仄互异，而上下相连的两联，音节又相对立，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所揭示及其所自实践于这段文章中的声律，确为以后骈文家所一致大体奉行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句法上因力求匀称之美而大体趋于四、六。句子的匀称自以偶数为宜，而短句的四言和长句的六言是最为适当的，因为比四言更短的二言太急促，比六言更长的八言太冗漫，于是句法多趋向于四言和六言，把这两种句式以各种相间相重的方法运用起来，可使通篇的句法兼具匀整和错综之美。骈文的形式，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具备，乃达到无以复加的完美境地。处于南北朝末期的徐陵、庾信的作品之被后人奉为骈文的典范，即因他们在其中集中地发挥了骈文各种形式因素的作用。我们试看下录的一段徐陵的《玉台新咏序》：

既而椒宫宛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螭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萱苏，微蠲愁疾。

这段文章的内容，不过说那些宫庭妇女在长日寂静的宫庭中，生活悠闲得够烦腻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作，平常赌博的游戏也玩厌了，只有写写诗来消磨时光，排遣愁闷。但在艺术形式上，辞藻典实的巧丽，音节的铿锵，对仗的工稳，句调的整齐而又错综，都标志着这一文体的艺术形式发展到高度成熟精美的地步。

由上所述，可见在我国文学史上骈文的出现，乃是我国文学在具有独特性的文字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它的逐步发展，乃是

以作家对于文学艺术形式美的极力追求为动力。最初由于文人在学问才华上相互争高，并企图从形式的艺术加工以加强对于内容的表现力，故作品的内容意义和形式技巧，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性。以后，尤其在宋齐以后，许多作者由于生活的贫乏空虚及妆点粉饰的需要，只是一味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在这种风气下，以致许多作品徒具浮华的外表，而流于形式主义。骈文之常为后世批评者所非议，其原因即在此。但是，即在前人认为文风卑靡即骈文最盛的南北朝时代，也还有不少优秀作家，以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思想感情为内容，以丰赡的学问修养和艺术才华，运用这一文体所需要的高度艺术技巧，仍为我们留下不少的文学艺术珍品。

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在文坛上形成的慷慨任气之风，使在东汉逐渐骈化的文章趋势，演为一股汹涌的洪流。这时在诗赋以外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是以散带骈，气势疏畅，论述事理则纵横捭阖，惊人视听，抒发情意则抑扬往复，悱恻动人，无丝毫壅阻疏隔之弊。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好象个不存形迹的人一样，不作势态，以感慨发端，叙说文事利弊，既是说理，亦是抒情，试看其末端一段：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尽管大体上都是骈句，而无论是句法上辞语上都很明切自然，所以读起来感觉气势流走，如转动圆环，婉转流利。他的《与吴质书》，也是一篇优美的抒情之作，其中有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

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前面悼念徐、陈、应、刘诸子，情意至为深厚，虽句较整齐，但很自然，未求辞意的属对，每在偶句之后，束以单句，故不觉板滞。而“观古今文人”以下一层接着，运用较重的散行句法，使气势趋于舒徐和缓，随后几层都是这样疏密相间，骈散兼行，整篇文势，随着作者感情的转换而萦回动荡。最后由伤悼朋友而转到自己，情致非常深永。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是和《与吴质书》一同被人称诵的作品。作者在其中主要的是论文学创作。开始一段叙说当时文人之盛，及对个别作家提出评论，中间纵论文学批评之事，最后表白自己生平の志气，要为国建立不朽的功业，文章还在其次，如果建立功业的目的达不到，就从事历史的专著。作者的志气和个性，无所隐晦地抒发得淋漓尽致。通篇才气横溢，光芒四射，和曹丕的《与吴质书》那样沉着凄婉的风格迥然异趣。下面录其首尾各一段，可以见其风概：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

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

曹植还有许多作品，如《求自试表》、《求通亲表》、《陈审举表》，都表达了他后来在长期政治压抑下，急欲为国有所作为而不可得的愤懑心情，表现出这个时代特具的慷慨之气。

这时陈琳的章表书记，堪称健笔。他的许多书檄，都是以洋洋洒洒的辞藻，夸张形势，引证古今，陈说利害，具有很大的鼓动力量。其中以《为袁绍檄豫州》最为卓著。建安五年(200)，袁绍从河北率领大军南攻曹操，命令陈琳草写这篇檄文，意在动摇曹操属下豫州地方的士众。文章着重宣传的在两个方面：一是宣布曹操的罪状，以表明袁绍讨伐曹操的正义性；一是宣扬袁绍军力的强大及曹操部众的弱点，以显示袁军的必胜，而争取与曹操相邻州郡的响应。檄文中除了揭露曹操丑恶的家世，杀害了有才能的朝臣，更有力地宣布了曹操在政治上的重大罪恶：

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忌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所有这些，作者都是根据一定的事实，将其集中，合盘托出，从揭露对方的罪恶着眼，尖锐地点明其严重性，便足悚动读者，激起共同对曹操罪恶的愤怒。后面摆出袁军压倒一切的优势，极为浩大壮观：

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掩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虜

庭，若举炎火以燎飞蓬，复沧海以沃燧炭，有何不灭者哉！

这里虽不免有所夸张，也大致符合当时实际形势。最后更从封建政治的高度，攻击曹操政治上的要害说：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勖哉！

这种政治上的罪状，在封建社会足以构成众矢之的，确是能使曹操读之骇然汗流浹背的。由于袁绍当时占有军事上的巨大优势，而曹操的行迹，确有不少足为口实的，所以这篇檄文，以仗义的姿势，慷慨陈词，表现了作者雄富的才华和强健的笔力。

魏末时期，足以代表骈文成就的作品，应推嵇康的《养生论》及《与山巨源绝交书》。这里只就《与山巨源绝交书》谈谈。这篇书文，是嵇康公开与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文章的大意，不过表明自己的性情不宜于处世从政，并认为人各有所好，各以满足自己志趣为乐，而已实无从政之志。但他的这一切意思并不是心平气和地表达出，而是以极愤怒的情绪，对当时庸腐的世俗表示了极端的轻蔑、讥诮，并给予强烈的攻击，以至“非汤武、薄周孔”。这篇文章也是嵇康个性无所隐饰的尽情呈露，适应他对个性的抒发，文笔极自由纵恣，尽致地展示了他那种崇尚自然绝弃流俗的情调。文章通篇骈散相兼，寓散入骈，运以散文的气度，带动骈句，故语势灵活，既不单调，也不呆滞，使人感觉辞意丰厚，音节雍容和婉。从下录这段，即可窥见其艺术特色：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

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西晋初期，是继建安之后又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当时各体杂文的鲜美缤纷，应是形成其文坛盛况的一个重要方面，陆机这方面的作品即足标志骈文在这一时期的进展和成就。他的许多名篇中，除了前曾谈到的《豪士赋序》外，《吊魏武帝文并序》也是值得注意的。作者在序文中叙说他致吊的原因，乃在秘阁看到曹操的遗嘱，于是慨叹曹操以一代雄杰，而在死亡面前无可奈何，其临死的表情与其生平太不相称。序中着重的指出曹操临终时对家庭琐细的生活事物的安排处理，这些已是他无能为力的，却偏要留情系恋，丧失了他应有的明智。吊文则从曹操剪灭群雄，建立朝廷纲纪，将进而完成功业，于西征途中被病，及临终以至身后情景，原原本本，郑重铺陈。序文和吊文各有分工，详略不同。如序文中的这一节：

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衰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

作者以雄健的笔力，高远的心胸，从曹操壮伟的生平志气，对照地慨叹他的无可奈何的死亡。而吊文的前半着重在叙述他生平的业绩，后半则叙写他临死及身后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被概括地纳入上举序文一节的慨叹中。而序文中所交代的曹操遗嘱的内容，在吊文中有的仅提点一下，如序文转述的遗嘱：“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可为，学作履组卖也。”吊文仅以“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轻轻带过。而有的则纵笔加以渲染，如遗嘱有这么一条：

吾婕妤人皆著铜雀台，于台上施八尺床，总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而吊文则着意描写他死后这条遗嘱的执行情况：

陈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宣备物于虚器，发哀音于旧倡。矫感容以赴节，掩零泪而荐觞，物无微而不存，体无惠而不亡。庶圣灵之响象，想幽神之复光，苟形声之翳没，虽音景其必藏。徽清弦而独奏，进脯糒而谁尝！悼总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台而群悲，贮美目其何望！

曹操的这一遗嘱，确表现了以他这样一个人物所不应有的痴恋。吊文即着意描写铜雀台中婕妤人在他死后按照遗嘱进行的活动，虽充满了悲伤气氛，却对死者无所补益，只是苦了关闭在台中的一群女性，使人感到他的这一遗嘱多么荒谬可笑。作者在这方面特意多着笔墨，当因其既富诗意，又具有讽刺意义。后来许多诗人以“铜雀台”或“铜雀伎”为歌咏主题，都是有着同感的。通篇看来，序文轻快，而吊文沉着，各自适合其本身的风格要求。序文句法气势灵活疏畅，犹有建安余风，而词语修炼凝重，表达意思较曲折，已不似建安时文章之易读了。

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是汉魏以来这一文体中最为精闳的作品，这里因篇幅关系从略了。而他的《演连珠五十首》，可说是文苑里一串光辉夺目的明珠，必须不吝笔墨来谈谈。连珠之体，乃就社会或自然的某一现象，加以推阐，引出政治或人生的重大道理，给人以满意的启发，语极圆转精练，而意味至为深长。据说这种形体创始于杨雄，后来从班固到潘勖都有拟作，但如《文心雕龙·杂文》所说：“欲穿明珠，多贯鱼目。”不足耀人眼目。只有陆机的这五十首，“义明而辞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引同前）下面选录五首，聊供鉴赏：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

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

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弊之政；五侯并轨，西京有陵夷之运。

臣闻弦有常音，故曲终则改；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已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

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

这种体式的写法，即以第一首为例来看，通首分三层：前四句提出自然界各种不同现象的作用。中二句为一层，就上述现象阐明其意义，乃是相反相成的。第三层则推论到人事与自然一致之理，就是臣子各严守自己的职责，好象音乐演奏，每种高下不同的音各发挥自己的作用，君主则总其成，好象演奏的指挥者，使各种音响和谐地配合演奏成优美的乐曲。这首的用意，在于应用从自然现象体会到的道理，比喻地指出国家政治上的正常之道。这一文体的艺术功用，是富于启发性，由前一事理推演出后一事理，然后关合到人事，使人感到情理的满足。在艺术上需要用心巧而属辞圆，使人读来如弄珠丸，晶莹流利，赏心悦目。

这一文体，短小精悍，运用非常灵便，取材的方面和表现的方法都非常繁多。如这里选录的第二首，意在说明一个人的职位要与其才能相称。前四句为一层，从道理上说任职超过才能的祸患，下一层二句用物来比喻，物的使用超过其功能会产生某样的结果。于是最后二句提出君主授职及臣子受职应遵守的准则。第三首前四句即径直陈说用人不公的政治危害，后四句举出历史事实，证明上面所说道理之正确。重大的政治事理及现象，极明白地摄取在这八句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显示了这一艺术体式的精美及作者艺术手腕的高强。

与陆机同时并称“潘陆”的潘岳，是以善

谏著称的。他的许多谏文，其中有些不过是为已死的统治贵族人物作妆饰品的应酬之作，没有高尚的价值，只有《马汧督谏》（《文选》卷五十七），为当时在关中战乱中立功的小军官表彰功绩，并代其申诉了屈死狱中的冤抑，也揭露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丑恶，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与“潘陆”同时的夏侯湛，著有《东方朔画赞》，及东晋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俱载于《文选》四十七卷），都是比较可读的名篇。

刘宋初期，文坛上颜谢并称，谢灵运的成就在五言诗，文笔则以颜延之为冠。颜延之的文章辞藻绮丽，用典繁丽，标志着文章变化中的新风尚。但他的一篇《陶征士诔》，倒是一篇异于他的文章风格常轨的优秀作品。他的性格情调，和陶渊明很相近，尽管他们二人的政治地位很悬殊，仍然成为好朋友，并有过密切的往还。陶逝世后，他即以其擅长的精美文笔，为陶写下这篇情词并美的谏文。

谏文前面有序，开始从虚的方面赞美高隐之士的可贵难得，然后叙述陶的生平事迹，再在谏文中致以伤悼之意。前后篇幅大致相称。序文中叙写陶的生平说：

有晋士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旨达，在众不失其寡，处群愈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

在这段文章里，陶的个性、学问方法、家庭生活、出处经过以及人生风度，均被作者以精美的文笔，形象完整地勾画出来，充分体现了陶的率意任真的精神特点。

在诤文里，作者描写陶渊明的弃官归去的生活景况道：

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归轍，葺宇家林，晨烟暮蔼，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这简直是一幅清美的山林隐士生活图画，在画面里也隐现了陶的乐尚自然的精神境界。

在诤文的最后，作者追述他们彼此的交谊，尤为亲切：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闻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觴相海，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慨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连风先颭，身才非实，荣声有歇，歆音永矣，谁箴余阙！

在这追述的彼此互相规戒的话言中，体现了他们道义相亲的精神。而陶指出的“违众速尤，连风先颭”，正切中颜的处世病根，所以“歆音永矣，谁箴余阙”二句，正是对于知心挚友的沉痛悼念，出自肺腑的哀声。这篇文章，只是在序文的发端，稍有虚饰之辞及通篇大致骈对工整，略现当时文风的特点，而整个情貌是较朴素的，所以获得情辞并美的艺术效果，这当是作者这篇诤文的写作，出自衷情，并意识到应与他的好友生平相称合之故。这篇文章中许多有关陶渊明生平的叙述，都大致符合实际，不事虚美，也是后世研究陶渊明的极可贵的原始资料。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刘宋时期一篇具有创造性的写景文。鲍照的妹名令晖，鲍照曾答宋孝武帝说：“臣妹才自亚左芬”，可见令晖有与左芬相上下的才华的，所以他才在这封信中恣笔描写，穷尽山川奇壮的神貌。这篇文章当是元嘉十六年（439）随临川王刘义庆赴江州时所写。由于长途旅行，备历辛苦，所有山川景物，均自其亲切感受中，以锤炼精工的笔力，烘染出来，都呈现出非常奇突壮伟的气势。如其在文章首端略叙旅途

经历后，感慨地写道：

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游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境，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矣。

于沿途周流旷观之后，便产生天地辽阔，只身貌小孤独之感。杜甫的《登岳阳楼》诗，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后，接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即景生情，感触正相类似的。鲍照在下面接着刻画所见周围景物：

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

这简直是一幅气势极为生动的重峦叠嶂图画。怒起争高的群峰，充塞天地的长陇，在烟云变化中气象万千，这些都可从这片断描写中感受到。我们再看中间一段对庐山的描写：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湖，峰与辰汉相连。上常积云霞，雕锦繡。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霄，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这幅望中的庐山所呈现的诸种烟云幻化的形象，真可谓尽态极妍。许梈谓“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并非过誉。这样以奇峭深刻的笔势，骈整的句法，摹绘山川景物，使人一路读来，觉宛然胜景过眼，应接不暇，不能不佩服作者笔力的雄健精工。在文章中集中笔墨刻画山水，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创举，后来只有在酈道元的《水经注》中才大量见到，在文章风格和写法上也颇有相近似之处。

齐梁时期，文人极力追求文笔的精美，当时文坛上盛加推赞的“任笔”，即足表明这种倾向。这种力求文笔的精美，主要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妆点门面的需要。据《南史·任昉传》说：“当时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起草即成。……梁台建，禅让文告，多昉所具。”因此，在任昉的华丽的文笔下产生的，多是

些虚伪的妆饰之辞，如果那些文辞稍有触及事实真象，也会遭到统治者的忌恨的。他的《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因为有些话说得直了，所以后来在齐明的时代一直受到压抑，“位不过列校”。这时许多章表之类的文章，尽管看来满眼锦绣，却很难读下去。只有一些书札之类的作品，表达了一定的思想感情，还是值得欣赏的。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就是一篇常被人传诵的作品。陈伯之原是梁初从齐朝降过来的大将，后叛投北魏。及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命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宏命丘迟作书与陈伯之，伯之又率众转回梁朝。

在《与陈伯之书》中，作者追溯陈伯之所以去梁投魏，乃因陈“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即寓有责备之意。随即说明梁朝是宽大为怀的，并告诉他的家庭的平安状况，接着以利害关系开导他，举出时间距离不远的历史事实，剴切地告诫他，投靠北朝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简直是不可理解的。跟着写出下面一段：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昔，抚弦登阵，岂不怆悵！所以廉公之思旧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作者在用许多大道理陈说譬解后，最后从感情上来触动对方。“暮春三月”四句，把江南的暮春风光，写得这样繁华绮丽，作者就以唤起陈对此时江南时节景物的回忆，和阵前故国的军容结合起来，勾起陈对故国的旧情，然后再举古代系情故国的名将作为范例，以推促陈作出反归故国的决心和行动。这段文章文辞清丽，情意悱恻，用事精当，足令受者怦然心动。当然，陈伯之终于返归梁朝，当有其实际的利害因素，决不会只是这一封书信的力量；但总可以说，这篇文章应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这时许多文人在与朋友的书简中，以清美峻峭的文笔，叙写居处游览的山水胜景，

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兹录其全篇于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这是一幅水墨素描的山水画，文笔简峭隽洁，于极精省的叙写中，给人以丰富的具体形象感受，使人如行山阴道上，觉山水争来亲人。而文章风格之素淡，在当时独具艺术高境，尤为可贵。吴均还有一篇《与顾章书》，可看作《与宋元思书》的姊妹篇。另外还有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也是一篇风格相类的写景短简，这里都不必再谈了。这些描写山水的清美篇章，可说是继刘宋时代山水诗之后，文坛上新出现的明星，正可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对山水的精刻的摹绘，南北相辉映的了。

这时最足代表骈文的高度艺术成就的应推刘峻的《辩命论》和《广绝交论》。早在曹魏时期的李康，曾著有《运命论》，从历代许多才德之士的遭际不幸，说明人生受着命运的主宰，以纾释其对现实的不平之慨。刘峻也因“率性而动，不能随俗浮沉”，故在梁朝未被显拔，乃著《辩命论》以抒发其愤激之情，认为“士之穷通，无非命也。”并认为前代许多人对命运的源流都探索得不够，于是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以大量的典实，从多方面雄辩地阐说命运的主宰力量，然最后还是归到“居正体道，乐天知命”，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显示了封建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软弱性。文章音节清壮，辞采精工，较之李康的《运命论》之气度温雅，语言朴质，从中可看出不同的时代艺术风格。我在这里只着重地谈谈他的《广绝交论》。

《广绝交论》是针对当时浇薄的世俗而作，具有尖锐的讽刺意义。东汉时，朱穆曾感于世俗交道败坏，愤激地写过《绝交论》。刘峻则因任昉死后，其生平所亲厚提拔的人士，无视于任昉儿子的穷困，于是充分发挥朱穆主张的绝交论点，写出这篇文章。据说曾受到任昉奖拔的到溉看到此文后恨了刘峻终身。作者在文章的前半以赋的手法，极意铺写世俗中的五类交情，以痛刺势利之徒。如其中的描写“势交”的一段：

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炉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骛。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骥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同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

这种对于官场趋炎附势的情态的描写，其效果实不下于我们所熟知的宗臣《报刘一丈书》中所形容的。它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精练集中，充分显示了这一文体的艺术特色。尽管作者所采用的艺术手段，在今天对我们说来是如此难能，但仍不妨碍我们对那种官场丑恶现象的生动鲜明的感觉。

作者在文章末端，明白表达了他写这篇文章的主旨说：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结银黄，夙昭民誉。遭文丽藻，方驾曹王；英跼俊迈，联横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肝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辘轳击轳，坐客恒满。蹈其阊阖，若升闾里之堂；入其阊阖，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盼增其倍价，翦拂使其长鸣，影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縗帟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郗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险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

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噉噉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

这段文章，以任昉一生的社会交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浇薄世俗的丑恶状态，有力地证明交友之应弃绝。文中首先叙写任昉的丰采高亮，及对人才的赏爱奖拔。次写当时人士对任昉的仰慕趋附之热烈，及经奖拔时的感恩戴德心情。最后写任昉死后门庭迅即宾客绝迹，而昔日契合金兰的密友，眼看任昉儿子贫困流落，而毫无同情顾念之意，使人深切感到俗情险薄之可恨，实应决然弃去。所有人情世态，在作者锐利笔锋刻画下，真如“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加以辞藻之精富及运用之得力，使人读来感觉痛快淋漓，愜理厌心，充分显示了这一文体的艺术功能。

作为南北朝文坛巨擘的庾信，他的《哀江南赋序》，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充分表达了他对故国痛定思痛的思想感情，标志着这一文体的高度成就。庾信亲身经历了梁王朝的金陵及江陵的两次相继复灭，而自己在从江陵奉使西魏时被扣留，后来虽在北朝受到重视而官位高显，而亡国之痛和羁旅之悲随时触发在他的许多诗赋和杂体文中表现出来，《哀江南赋》是他的这些感情最充分集中的表现。赋的前面有序，表白自己写这篇赋的动机，概略地回顾了自己在国家丧乱中的遭际，及表示对于国家败亡命运的沉重悲伤。

序文开始，即郑重地举出自己和国家经历的几件最重大的事故：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

只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易明白这几句的内容：叛将侯景攻入金陵，梁王朝金陵政权复灭，庾信西奔江陵，从江陵奉使西魏被留，梁王朝在江陵再建立的政权又被西魏消灭，所有这些，都被提纲挈领地纳入其中。

中间追述自己使魏被留之事说：

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

珠盘而不定。鍾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

自己在强权胁迫下，奉使无功，作为使者而被囚禁，长期留在敌国，这一切藉用人所共知的典实，表述得极为明白恰当。这几句就句法音节而论，都可视为四六体的标准格式。

序文末段，以愤激的心情回顾金陵和江陵的破灭情况：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纔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

举出古代江东英雄人物的辉煌业绩，深致痛愤于梁政权之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尤其是以创业及中兴之主，终不免俱为降俘，更令人感到凄怆伤心，于无可奈何之际，只有归之天命。但这不过是作者为了宣泄其故国之痛而聊以自解之辞，其实他对金陵和江陵相继破亡的人事因由，在赋文中阐述得至为明确的。随着作者情绪的激烈震荡，文章一气贯注，势极矫健宏壮，诚如杜甫所赞“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序的末端还说：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飘道阻，蓬莱无

可到之期。”自己过去生活的故国，简直如人间天上，可望而不可即。可以从而想见他企望故土，宛如逝梦之不可追一般难过的心情。

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并可视为骈文达到成熟境地的典范，骈文的艺术形式所需要的条件都已具备，并被运用得非常精当。就思想意义言，前者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即在艺术形式上前者稍逊后者的工整，而前者气势的雄健及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更非后者所能企望的。

如上所述，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这一精美文体的必然产生，是由我国文字的特点所决定，成为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文艺体裁。而其发展成熟，则是经过无数才智之士对于文艺形式和表现手段的努力追求，在长期累积中达到的。它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各类名篇，以上所举，不过略示梗概而已。尽管它在形式上多所拘束，而在许多优秀文士的丰富学问修养及卓越艺术才能的运用下，仍能从容规矩，游刃有余，无论抒情、说理、叙事、写景，俱能给人以这一文体所特有的艺术效果和美感。而作为文艺理论专著的《文心雕龙》，以刻镂龙文之妙笔，论述为文之用心、精辟深宏，透浹骨髓，全部文章如水晶宫殿，光彩夺目，令人极为信服地感到这一文体所蕴有的艺术功能。